

評介葛塔秋《帝國後的世界創造》：後殖民自決重探\*  
Revisiting the Postcolonial Self-Determination:

A Review of *Worldmaking after Empire* by Adom Getachew

詹亞訓\*\*

Ya-Hsun CHAN

葛塔秋（Adom Getachew 2019）的《帝國後的世界創造：自決的興衰》（*Worldmaking after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Self-Determination*）帶領讀者重探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降30年間泛非主義的後殖民自決運動。延續黑色大西洋<sup>1</sup>的視角，本書以戰前泛非主義（Pan-Africanism）的反帝國際主義<sup>2</sup>為背景，提供來自美洲、非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的泛非後殖民自決論述。作者以「帝國階序」及「非支配」的概念挑戰環繞西發利亞主權及《十四點和平原則》（*Fourteen Points*）展開的自決概念敘事，回顧了來自迦納、奈及利亞、千里達與牙買加等七個國家，由兩代泛非主義領袖開啟的三波後殖民自決的思想與行動軌跡。<sup>3</sup>本文首先將解析葛塔秋的分析框架與論述

---

投稿日期：2020年3月12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6月30日。

\* 特別感謝《文化研究》期刊編委會與兩位匿名評審委員提供重要的批評與建議。

\*\* 詹亞訓，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博士候選人。

聯絡方式：153-8902日本東京都目黑區駒場3-8-1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chanz2016@g.ecc.u-tokyo.ac.jp。

- 1 「黑色大西洋」的概念來自吉爾洛（Paul Gilroy 1993）。葛塔秋呼應吉爾洛透過跨大西洋黑奴貿易及非洲離散反思現代性問題的思考，將她對泛非主義的考察回溯至黑色大西洋所承載的歐洲帝國擴張的暴力經驗。
- 2 這包括了1900-1945年間前後召開四次的泛非大會（Pan-African Congress）、一戰期間成立的世界黑人促進會（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1927年成立的反帝大聯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及赤色職工國際（Profintern）於1930年設置的黑人勞工國際工會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mmittee of Negro Workers）等組織展開的反抗運動。
- 3 此書主要分析對象包括第一代泛非主義者中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杜伯伊斯（W. E. B. Du Bois）、千里達的社會主義領袖派德摩爾（George Padmore）與曾

企圖，其次梳理其分析中三波泛非主義後殖民自決運動，接著指出其分析整體之獨特性與侷限，最後透過帝國秩序重組、東亞協同體、戰後賠償爭議等議題指出借徑《帝國後的世界創造》重新思考東亞的歷史經驗的可能性。

## 一、帝國後的世界創造：從不干涉到非支配

《帝國後的世界創造》涉及兩組分析概念：世界創制（world-constituting）與世界創造（world-making）、帝國階序（imperial hierarchy）與後殖民自決（postcolonial self-determination）。以1492年以歐洲帝國透過殖民主義展開的「世界創制」為對立軸，葛塔秋提出「世界創造」的概念描繪黑色大西洋對抗殖民暴力的歷史經驗（Getachew 2019: 3-4）。這組分析概念一方面意味著從帝國統治到支配暴力之視角轉換，另一方面亦指涉創制與創造兩種動能的拉鋸。延伸至第二組分析概念，黑色大西洋敘事中泛非主義的自決運動訴求「國際秩序的根本性重組」與「對抗帝國階序的遺緒」，同時關注政治原則轉換的過程中以種族區分及不平等整合（unequal integration）的形式延續下來的等級式支配與治理（ibid.: 5-7）。在這個意義上，「帝國階序」指涉國際秩序中未隨帝國解體而消散的帝國支配遺緒，而「後殖民自決」的概念突顯的是自決運動做為後帝國—後殖民的解殖實踐與帝國遺緒間的密切關係。

透過上述兩組分析概念可以發現《帝國後的世界創造》提示的並非創世記式的獨立建國記，而是一場漫長的後帝國—後殖民的世界改造戰。回顧自決概念興起的時代，葛塔秋首先質疑所謂「威爾遜契機」（Wilsonian

---

加入美國托派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詹姆士（C. L. R. James）、史學者同時也是千里達首任總理的威廉斯（Eric Williams）、迦納獨立運動領袖及首任總統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奈及利亞獨立運動領袖及首任總統阿茲奇維（Nnamdi Azikiwe）、牙買加的泛非民族主義者加維（Marcus Garvey）、律師兼勞工運動領袖的N·曼利（Norman Manley）；第二代泛非主義者中N·曼利的次子，後來成為牙買加首相與不結盟運動倡議者的M·曼利（Michael Manley）、坦尚尼亞獨立運動領袖及首任總統尼雷爾（Julius Nyerere）。

moment)<sup>4</sup>以《十四點和平原則》及國際聯盟為自決概念之原點的論調，批評「威爾遜契機」實際上展演的是既存帝國秩序「反革命」的企圖。回顧威爾遜（Woodrow Wilson）及國際聯盟委任統治的推手史穆茲（Jan Smuts）的發言，她指出自決最初其實被視為專屬於白人種族的一種「能力」。在委任統治的決議過程中，奴隸制成為非洲民族缺乏自決能力的重要判準；它印證了非洲文明的落後，且再次說明歐洲支配的不可或缺（ibid.: 50-54）。面對黑人問題（negro question），依據能力差異建立等級式的自治制度亦一直是兩人的共同見解（ibid.: 44-50）。在種族主義思維下，國際聯盟除了主張委任統治的「負累會員資格」（burdened membership）有助於消滅奴隸制，亦展開為殖民經濟改造黑人勞工的勞動力轉型計畫（ibid.: 58-62）。換言之，自決概念在政治上被操作為帝國秩序底下殖民地階序的重新部署，在經濟上亦影響了殖民經濟的勞動力配置。

延續黑人民權運動領袖杜伯伊斯（W. E. B. Du Bois）「二十世紀的問題乃是膚色線（color line）的問題」（ibid.: 15）之命題，葛塔秋指出一戰後的自決論述反映的正是前述以種族區分及不平等整合的形式延續下來的帝國階序。此階序由政治的排除—吸納邏輯構成，一方面否認非歐洲國家之文明及主權地位，另一方面肯認其「在某種意義上乃是國際法人及國際法的對象」，進而以不賦予完整資格的方式將其編入國際社會（ibid.: 19-20）。她強調殖民地不是被帝國秩序排除在外，而是以不平等的整合邏輯納入其世界創制的圖示中。對此，泛非主義的後殖民自決要求的並非國際社會的接納，而是「國際秩序的法、政治與經濟結構之徹底改造」，亦即主張世界的構成必須改以「非支配」（non-domination）的原則來進行（ibid.: 25）。葛塔秋強調，有別於西發利亞主權式的自決概念所強調之主權國家的領土及內政不干涉原則，「非支配」的視角更關注以國際法秩序為基礎的帝國階序問題（ibid.: 31-33）。

4 “Wilsonian moment” 的說法典出馬內拉（Erez Manela 2007）。馬內拉認為受《十四點和平原則》影響，自決的概念被定義為不受外部干涉基於自我意志決定其自身政治命運的權利，並被視為一戰以降國際法所規範的國際事務之基本原則，同時掀起埃及、印度、中國及朝鮮的革命運動風潮（ibid.: 8-11）。葛塔秋質疑這樣的觀點，並回顧一戰前後威爾遜的白人種族主義思想與透過國際聯盟壓制革命風潮的立場，稱「威爾遜契機」為「反革命時刻」（Getachew 2019: 39-40）。

## 二、戰後泛非主義的後殖民自決

### （一）第一波後殖民自決：從黑人問題到帝國奴役（1943-1960）

以奈及利亞、迦納與千里達的泛非主義為主軸，葛塔秋描繪了二戰末期至1960年剛果危機爆發為止的第一波後殖民自決運動所追求的「非支配」想像。這波運動以爭取殖民地不受外來統治的自由為核心，批判聯合國的安理會及託管制繼承的帝國階序及種族主義。1943年奈及利亞的阿茲奇維（Nnamdi Azikiwe）公開批評「非自治領土」的設計不僅妨礙殖民地自決，也阻礙「其社會、經濟與政治生活的民主化」（*ibid.*: 72）。迦納的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呼應這個批評，並進一步主張以「所有人的自決權」祛退過往帝國的幽靈（*ibid.*: 73-75）。千里達的派德摩爾（George Padmore）亦借用《世界人權宣言》提出民主社會主義式的區域構想，期望能夠「在區域的基礎上實現做為自治各國的聯邦之先決條件的自決權」，最終建立非洲合眾國（*ibid.*: 76-77）。

結合戰間期的泛非帝國主義批判，恩克魯瑪調動馬克思的剝削理論展開對「帝國」的詰問。<sup>5</sup>葛塔秋認為，相對於以金融資本批判為主軸的列寧傳統，對種族剝削的關注展現了泛非帝國主義批判的歷史特色。<sup>6</sup>恩克魯瑪以奴隸制為主戰場提出了「帝國奴役」的觀點，指對黑人勞動力的剝削是歐洲帝國主義支配的關鍵機制。對他而言，戰前國際聯盟一面打擊黑奴買賣，一面拓展黑人殖民經濟的「黑人問題」對策，在剝削的歷史上其實正

5 葛塔秋認為這一波後殖民自決運動的帝國主義批判至少可以追溯至詹姆士的《黑色雅各賓》（*The Black Jacobin*）（1933）、杜伯伊斯的《黑色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1935）與威廉斯的《資本主義與奴役》（*Capitalism and Slavery*）（1944）。

6 此處葛塔秋嘗試突顯種族議題在泛非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想中的理論優位。她指出從杜伯伊斯到派德摩爾乃至恩克魯瑪，第一代後殖民自決的領袖幾乎都受到列寧思想的影響，許多人同時也是革命政黨的領袖。此外，她也強調這一代人的思考不全然等同於列寧主義，「黑人勞動力」（*negro labor*）的議題即是葛塔秋重新定位泛非帝國主義批判的重要依據。然而雖然葛塔秋的分析著重於一戰以降國際聯盟與聯合國對「黑人問題」（*negro question*）的操作，列寧關於「黑人問題」的發言與分析至少可以追溯至1914年，其帝國主義批判並非完全無涉種族議題。有關列寧如何結合黑奴及白人勞動者階級處境的議題，以及列寧主義與種族議題對泛非主義的影響，可參考帕特曼（*Paterman* 2020）。

扮演了推動「帝國奴役」的角色（ibid.: 80-84）。

葛塔秋總括第一波後殖民自決運動最具影響力的論述策略在於將自決表述為眾民皆同的權利，拒絕戰前依附於種族能力的自決論調；運用人權話語對抗帝國階序，並透過「帝國奴役」批判延伸「非支配」的問題意識。恩克魯瑪的「帝國奴役」批判轉化了過去對「黑人問題」的認識，強調奴隸制並非種族與文明議題，而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意義下的剝削問題（ibid.: 84）。1960年，這樣的呼聲成功推動聯合國大會通過第1514號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然而，隨著內戰情勢激化，甫宣布獨立的剛果很快地變成聯合國部隊、蘇聯軍及美軍的代理戰場。這場俗稱剛果危機的後帝國內戰澆了後殖民自決一盆冷水，在人權話語底下展開的自決運動也因此面臨重大的挫折。

## （二）第二波後殖民自決：泛非共同體的區域主權想像（1958-1967）

剛果危機對泛非主義領袖敲響一記警鐘，也是恩克魯瑪提出著名的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批判的重要背景。他借徑列寧「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命題，而提出了新殖民主義乃是「帝國主義的最後階段」這樣的批評（ibid.: 101, 108）：

在帝國主義的新殖民階段，帝國列強利用其經濟控制間接達成政治箝制，結果造成一種扭曲變形的後殖民主權。〔…〕「新殖民諸國的統治者藉由得到殖民主的支持掌握政權，而不是根據人民的意志。」〔…〕在「後殖民困境」——形式獨立與事實依賴間的斷裂——的脈絡中，民族國家似乎把舊殖民地與非正式支配的新關係綁在一起，而非確保自決的制度性條件。（ibid.: 108）

換言之，新殖民主義指涉帝國階序建立在舊殖民地經濟依賴的基礎上，使自決權被讓渡給民族國家型態中的帝國，並受其非正式經濟所支配。憂心此情勢下舊殖民地將再次成為帝國競逐的場域，第二波後殖民自決運動嘗試透過區域聯邦的制度穩固區域主權，擺脫經濟依賴以推進主權獨立的未竟之路。有別於法非共同體（Françafrique）與歐非共同體（Eurafrika）等在舊殖民勢力範圍內延續過去的殖民經濟紐帶的方案，這波運動聚焦於1950年代末成立的西印度群島聯邦（West Indian Federation）與非洲國家聯盟（Union of African States）之區域主權架構。千里達、牙買加、迦納與奈

及利亞四國的運動領袖分別就區域共同體的聯邦與邦聯制（federation and confederation）展開了辯論。

恩克魯瑪及千里達的威廉斯（Eric Williams）借用聯邦制的設計，期望能夠建立由聯邦國家（federal state）<sup>7</sup>主導非洲及加勒比海的經濟發展與重分配的制度（ibid.: 110）。受到美國聯邦主義中憲政制度以及惠爾（Kenneth Wheare）的大英國協憲法構想的吸引，他們注意到區域的共同經濟利益有助於消弭聯邦內部的矛盾，同時認為國際憲法有助於整合後殖民國家的多民族處境：「若有對『國家』的信念，非洲人就算不是同一民族也能夠創造其自身的團結。」（ibid.: 116）據此他們主張透過制訂憲法將各會員國的部分主權讓渡給聯邦國家，在「國與國間的法制多元主義」的基礎上維護區域共同市場的利益（ibid.: 119, 132）。

相較於此，阿茲奇維與牙買加的N·曼利（Norman Manley）擔心中央集權組織無助於區域共同體制度化。雖然支持聯盟構想，N·曼利更傾向於集權程度低、自主彈性高的邦聯制，並主張透過貿易與關稅保護政策確保各國財政獨立（ibid.: 128-130）。阿茲奇維持類似看法，他質疑將共同市場的決策權交付中央集權的組織不僅削弱非洲國家的獨立性，也違反自決權與不干涉的原則（ibid.: 133-134）。在共同市場的議題上，他採取同時代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機能主義立場，主張透過條約規範會員國間的協作關係（ibid.: 136-138）。

在聯邦制與邦聯制的對立下西印度群島聯邦與非洲國家聯盟相繼解體，1963年繼之而起的非洲統一組織（Organisation of African Unity，下稱OAU）複製聯合國模式，強調非洲事務的不干涉原則。196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131號決議《關於各國內政不容干涉及其獨立與主權之保護宣言》，緊接著奈及利亞內戰爆發，OAU否決比亞法拉的獨立與自決宣言，內戰兩造陷入超過二年的代理戰爭狀態，第二波後殖民自決運動自此式微，「非支配」主張

7 雖然在美國的聯邦主義中“state”一詞既可指涉各個獨立的「州」也可指涉權力在一定程度上集中的「國家」，泛非主義的聯邦理論著重於建立集權式的組織以處理區域共同的經濟議題。因此葛塔秋此處談的“federal state”更靠近由各會員國共同組成「聯邦國家」而不是「聯邦州」。

重又面臨主權與帝國階序的矛盾。同時，非洲內部否認特定民族自決權的狀況，亦反映出聯邦／邦聯的對立背後國際主義論述的內在張力。亦即，區域主權與個別主權的自決意志之間的衝突，是否可能透過制度設計消弭？是否存在一種憲政設計既能夠要求主權讓渡予區域主權，又維護個別主權的完整性？葛塔秋認為這一波運動的重要性在於「致力於設計直接連結著改造新殖民依賴的核心之經濟關係的國際政治機構」，同時嘗試「在國際層面上確保非支配」的交往關係（*ibid.*: 138-139）。以新殖民主義批判為軸線，她指出這波運動對經濟依賴的關注使焦點從政治主權延伸到經濟主權、從抵抗外來統治延伸到區域主權，同時也提示了從「黑人問題」到「帝國奴役」之後另一次視角轉換。

### （三）第三波後殖民自決：非洲國際主義與NIEO（1963-1974）

兩次區域共同體的失敗經驗推動泛非主義的新世代在父執輩的路線之外尋找新的可能性。以經濟依賴與全球分工之間的延續性為主要的問題意識，第三波後殖民自決運動企圖在既有的條件中逆轉經濟依賴的狀況（*ibid.*: 144-145）。葛塔秋指出，較之於恩克魯瑪及威廉斯在經濟議題上透露出鮮明的發展理論與西方現代性的思考，N·曼利的次子M·曼利（Michael Manley）和尼雷爾（Julius Nyerere）等第二代泛非主義領袖在經濟論述上受到依賴理論較多啟發。他們重新檢視牙買加及坦尚尼亞的經濟體質與全球分工位置，主張後殖民處境和經濟全球化不可分割，必須依據在地條件創造最適的經濟系統。此外，他們亦轉向福利國家尋找論述資源，響應國際經濟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下稱NIEO）的呼聲，嘗試透過國際主義改善經濟依賴的問題（*ibid.*: 146-152）。

在經濟思維上，第三波後殖民自決運動靠近依賴理論的第三世界立場，但是拒絕保護主義式的自立（*self-reliance*）。這波運動強調非洲國家不能以脫離全球經濟為目標大興保護貿易，或者與國際秩序一刀兩斷（*ibid.*: 152-155）。M·曼利據此對恩克魯瑪的新殖民主義批判提出了新的詮釋，強調後殖民國家的處境與「全球經濟的結構性邏輯」密不可分；尼雷爾亦主張國內平等仰賴後殖民國家創造出一個國際機制去過濾「全球經濟的結構不

平等」(ibid.: 157)。他們也進一步提出國際互賴(interdependence)的方案，嘗試扭轉經濟依賴的處境。這個世代的國際主義不再追求現代化理論的經濟發展與資本主義階段式的革命觀點：

後殖民式的自立必須從殖民經濟根深蒂固的依賴關係著手，並設法解除捲動著支配的等級式關係。這個克服依賴關係的構想要透過國內的社會主義政策<sup>8</sup>及國際的國際經濟新秩序(NIEO)來實現。(ibid.: 154)

以國內的經濟社會改革與NIEO為目標，M·曼利與尼雷爾嘗試透過福利國家主義的模型推動福利國家國際化，建立國際互賴的經濟秩序(ibid.: 157-162)。調動依賴理論與福利國家的思考，他們期望在世界市場中確保非洲國家的民主決策、等份分配與主權平等。1964年以降，第三波後殖民自決運動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中展開一系列有關NIEO的談判協商，針對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條件、關稅優惠與債務調整，挑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及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的主導優勢(ibid.: 163-165)。然而一如世代間的立場矛盾所顯示的，後殖民自決運動內部也面臨路線衝突的問題。在第三波運動缺乏政治制度及國際機構組織論述的狀況下，他們的非洲國際主義未能有效整合國內與國際經濟重分配的議題，發展中國家亦未能就NIEO達成共識(ibid.: 167-169)。

1974年聯合國陸續通過NIEO之宣言、綱領及憲章，但非洲國際主義的提案並沒有獲得支持。受到70年代石油危機衝擊，葛塔秋描述的第三波後殖民自決在牙買加及坦尚尼亞分別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紓困方案與結構改造後衰退，帶有國際主義想像的自決論述從此失去舞臺，並被新自由主義取代(ibid.: 171-175)。二戰以降持續三十年的「世界創造」至此劃下句點，泛非主義的後殖民自決最終沒有打造出他們理想中的世界。80年代末，轉向新自由主義經濟的M·曼利甚至形容當時的構想「奇幻而不切實際」(ibid.: 180-181)。然而對葛塔秋而言，這一段「世界創造」不

---

8 這個階段的泛非主義自決運動所謂社會主義(socialism)著重政策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Getachew 2019: 168)。不同於50-60年代間，前一代運動領袖靠近列寧主義或毛主義的理論認識與行動策略，1960年代末的牙買加與坦尚尼亞較著重於經濟政策與社會福利的改良，福利國家主義也因此成為第三波後殖民自決運動的在地與國際策略的接點。



斷嘗試結合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挑戰了長期佔據主流地位的西發利亞主權論述的同時，在運動策略上亦展開多方嘗試，為解殖累積了寶貴的經驗（ibid.: 170）。

### 三、《帝國後的世界創造》：創新與未竟

整體而言，《帝國後的世界創造》在敘事結構、重探自決概念、分析手法三個方向上展現了獨特的企圖與研究成果，為讀者提供了創新的視野。首先，有別於一般以羅馬治世（Pax Romana）<sup>9</sup>為依歸的帝國史敘事傳統，葛塔秋透過「世界創造」的概念展開的黑色大西洋敘事，考察了「帝國階序」與後殖民自決運動之間的密切關係。此敘事著重於描述帝國瓦解、秩序重組的過程中，等級式支配邏輯如何牽動後殖民自決運動的發展以及自決概念內涵的變遷。除了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張力，葛塔秋細膩地呈現出泛非主義運動對帝國知識體系的批判性挪用，帝國與殖民地之間思想與行動的複雜層次因而進一步展開。

其次，在自決概念的認識上，葛塔秋質疑以西發利亞主權體系為前提的不介入、不干涉（non-intervention, non-interference）之定義。透過後殖民自決的分析，她一方面挑戰以「威爾遜契機」為原點的自決論述，另一方面亦反覆指出馬克思主義在泛非運動中的先驅性。<sup>10</sup>受國際社會主義運動

9 Pax Romana指羅馬帝國治下全境領土的和平狀態。以此概念為核心的帝國敘事中，帝國一般被描述為跨境的霸權式秩序，一種確保和平與安定的政治型態（Arrighi 1978: 38）。

10 除了指出第一代泛非主義運動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思想的親近性之外，葛塔秋亦曾經於《雅各賓》電臺的訪談中以「馬克思源起」（Marxian origin）描述泛非主義嘗試與挾帶種族思維的帝國階序式自決概念區分的源流。詳見Denvir, Daniel. 2019/10/27. “Worldmaking after Empire with Adom Getachew”. *The Di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digradio.com/podcast/worldmaking-after-empire-with-adom-getachew/> on Jan. 7, 2020.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自決概念的興起一般回溯至威爾遜與列寧兩條路線，以及一戰後國際聯盟與第三國際的對抗關係，葛塔秋對「威爾遜契機」的批判並不代表她傾向於以「列寧契機」掌握後殖民自決運動（參見本文註釋6）。《帝國後的世界創造》最主要的企圖仍在於勾勒一戰後以種族思維為核心的自決論述與泛非運動之間的張力，以及二戰後的後殖民自決運動對這樣自決論述所引發的種族暴力及殖民經濟的批判（參見本文註釋1）。

airiti

影響的後殖民自決在她的分析中最大的特色是在帝國階序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遺緒中不斷尋求結合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可能方案，也因此後殖民自決涉及的不僅僅是單一民族或者單一主權國家的想像，更是跨民族、跨國家、跨區域的自決主張。更重要的是，《帝國後的世界創造》指出了泛非解殖與自決概念之間存在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內在張力。在聯邦／邦聯制的爭論中、在OAU否決比亞法拉自決權的案例中、在泛非主義未竟的NIEO構想中，皆可以看到作者所欲描繪的後殖民自決內在的矛盾與複雜性。

最後，有別於以泛非大會（Pan-African Congress）為軸線的分析（Adi 2018: 43-47; Young 2009: 23），葛塔秋廣泛援用運動領袖的著作、日記、隨筆、演說等一手資料，以前殖民地國家對帝國階序的認識及在地的反抗經驗為基礎，著眼於後殖民自決論述的階段性變化。這個視角不僅提供了跨世代、跨地域的分析，也充實了相對缺乏分析之個案（比如千里達與坦尚尼亞）在泛非運動中的影響與貢獻。

除此之外，本文也必須指出《帝國後的世界創造》未能涵蓋，但是對於認識泛非主義的後殖民自決運動有重要意義，值得進一步考察的議題。敘事軸線上，儘管葛塔秋跳脫泛非大會的分析有其獨到貢獻，卻也淡化了貫穿整個20世紀的泛非大會的影響力及其意義。泛非大會在時間跨度上橫越了二次布爾戰爭到後冷戰，也涵蓋了北美、非洲與加勒比海地區的運動能量；作為跨時代、跨地域的運動連帶之重要節點，它不僅僅是葛塔秋關注的後殖民自決30餘年的運動歷程之背景，更承載了漫長的歷史變遷的痕跡。在葛塔秋的分析中，帶有國際主義理想的後殖民自決在石油危機的衝擊底下衰退，並為新自由主義及全球正義論的政治意識型態取代（Getachew 2019: 174-175）。相對的，泛非大會的影響力延伸至21世紀，OAU（2002年改組為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和非洲經濟共同體（African Economic Community）等組織也持續運作。那麼1980年代以降乃至21世紀，泛非主義的內涵出現了什麼轉變？如非洲聯盟這樣的國際組織是否孕育了不同於作者描繪的後殖民自決的能量？自決概念在這些組織中

是否受到新自由主義或全球正義論影響而產生變化？這些都是在葛塔秋的問題意識底下值得進一步探問的課題。

最後，在作者的分析中，帶入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視野的企圖鮮明，亦提及社會主義思想對兩代泛非知識分子之間路線差異的影響，只是很可惜並未就同時期蘇聯及中國的社會主義與泛非主義之相互關係做出具體分析。實際上，除了葛塔秋提及的剛果政變，從戰間期到冷戰，蘇聯的影響力一直存在於非洲大陸。同樣的，中國自50年代起持續拓展與非洲國家的雙邊關係，進入1980年代後建立起長期且大規模的中非貿易關係。這些皆反映出社會主義之於非洲國家不僅僅是後殖民自決的思想資源，也是政治經濟學上不可忽視的要素；戰後社會主義思想的國際主義論述對泛非主義的自決論述之影響還需要更深入的系統性分析。也特別是在後殖民自決運動展開的新殖民主義批判的視角下，當中非「南南合作」的聲浪不斷遭遇「中國帝國主義」的質疑的時刻，更需要釐清此批判在1980年代以後經歷何種轉變？於當前是否仍然有效？

#### 四、東亞脈絡下的帝國階序與自決話語

對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自決的概念通常與民族連結而以「民族自決」的型態登場。在臺灣的歷史敘事中，民族自決經常被視為重要的政治、社會與歷史起源，以及政治意識與國家認同的分水嶺。<sup>11</sup>解嚴30餘年，民族自決更成為與國家主權密不可分的歷史遺產與國際策略。<sup>12</sup>加之以「帝國邊陲」與「帝國夾縫」所描述的生存處境，或者「次帝國」所批評的主體狀態，臺灣島嶼的目光似乎投射出各種帝國形象。<sup>13</sup>以帝國階序為切入

11 比如20年代援引國際聯盟框架下弱小民族自由解放的趨勢，以自治制度掣肘帝國立憲精神與南進版圖要求設置殖民地議會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便經常被描述為自決及主權意識的起點（吳乃德2013: 8-12）。

12 2019年，被稱為新版〈臺灣前途決議文〉的民主進步黨（2019/09/28）〈社會同行世代共贏決議文〉重申「臺灣的前途走向，屬於臺灣全體住民的自決權」，並主張「社會同行以強化臺灣，強化臺灣以連結世界」。

13 此處「帝國夾縫」、「帝國邊陲」與「次帝國」相關的討論可分別參見吳介民（2004）、吳叡人（2016）、陳光興（1994）。

點，《帝國後的世界創造》是否蘊含重探東亞脈絡下自決概念的線索？

較之於葛塔秋透過「帝國階序」及「後殖民自決」展開的泛非主義分析，東亞的歷史經驗中所謂泛亞主義（Pan-Asianism）的範疇相對鬆散，同時帶有依附於亞洲內部的帝國主義及帝國秩序之色彩。有別於泛非主義與帝國階序之間鮮明的張力，部分支撐日本帝國主義的亞洲主義思考使得泛亞主義本身便包含連帶與侵略兩種性格（米谷匡史2006: 1-2）。而在泛非主義的經驗中展現為帝國的等級式支配的「帝國階序」，在泛亞主義中首先反映在以帝國主義式的亞洲區域連帶<sup>14</sup>制衡西方帝國主義的傾向上，其次則反映了亞洲區域連帶有賴強力的指導者在政治、軍事、經濟各面向上發揮支配力這樣的思考。換言之，泛亞主義的想像不僅僅意味著等級支配，更突顯出帝國主義實踐的內在張力。除此之外，一如葛塔秋的分析所呈現的，泛非主義中的自決概念隨歷史變遷，其意涵亦有所變化。在上述「帝國階序」貼附著亞洲區域連帶思考的背景下，自決論述如何在一戰前後民族自決的潮流中登場，後來又如何隨著東亞的歷史經驗而變化？本文最後以帝國秩序重組、東亞協同體思想與戰後賠償議題等面向，提示重新檢視東亞帝國階序與自決概念的可能途徑。

首先，以日本帝國在一戰前後對亞洲各地民族運動展開的調查為例，其調查報告除了提供西方列強的殖民模式分析，也透過殖民地的民族運動判斷其自治能力。這些調查被納入日本帝國應對臺灣及朝鮮的參考，也成為往後大東亞共榮圈構想中是否賦予亞洲各地域自治或獨立資格的判準（河西晃祐2012: 80-93）。相對於此，矢內原忠雄的殖民政策改革主張，透露出另一種線索。受到英國的帝國改造理論的影響，矢內原考察了米騷動與三一運動，指出本國與殖民地的改革必須同步展開，否則雙方在統治不平

14 泛亞主義經常在跨國連帶的脈絡中被理解為亞洲的「國際主義」的一種。同時必須注意的是泛亞主義本身的歧異性，使其同時帶有不符合「國際」主義的色彩。回顧日本的亞洲主義論述，不難發現其中一個重要的特色便是作為「現代國家」的日本與「非現代國家」的其他區域（中國、臺灣、朝鮮）之區分。這樣的區分可見於20世紀之交的「中國非國論」、1930年代的「滿州、支那例外論」，也支撐著日本帝國合理化其軍事行動的國家心理。因此，有別於泛非主義的思考框架，本文認為「區域」更貼近立基於「非現代國家」之宣稱上的泛亞主義的跨國連帶，而不是「國際」。

等及經濟秩序上的落差將阻礙帝國秩序的改造（米谷匡史2003: 141-143）。在此立場上，他期待殖民地自治運動能夠發展，也認為殖民地自治是帝國改造不可或缺、且必須重視的課題。透過葛塔秋的問題意識，可以注意到東亞脈絡中對民族自決的等級式掌握與帝國秩序變遷的交互作用，同時也可以連結至改革思想如何將殖民地自治納入帝國秩序進化視野的議題。

進入戰爭時期，除了滿州國的「五族協和」構想中嘗試結合自治概念與帝國主義的典型之外，「東亞協同體」的思想也不乏帝國階序涉入自決論述的事例（Duara 2003: 65, 199）。以蠟山政道為例，面對九一八與盧溝橋事變後國際秩序的變動，他曾經提出東亞的民族主義尚且缺乏足夠的自治能力，因此需要日本主導的區域主義協助防衛與開發之解釋（蠟山政道1938: 11-12, 23）。<sup>15</sup>在這個立場上，他結合地緣政治與區域主義的思考，主張根據民族的自治能力差異設置東亞的「聯邦政府」或「國家聯盟」，以穩定東亞的區域秩序（蠟山政道1941: 34-40）。

二戰後面對賠償議題，日本帝國南進的推手板垣與一曾經在1950年代大力主張，透過賠款拓展日本在亞洲區域經濟中的實力，並在萬隆會議召開前盛讚不結盟運動有助日本在美蘇對立下開拓第三條道路——經濟民族主義（辛島理人2015: 137, 154）。板垣的例子提示了南進理論與戰後發展主義思考之間的連續及變化，也使我們注意到一般被視為亞非拉新興國家宣示主權的萬隆會議，同時影響了後帝國時代的經濟民族主義主張。時序若再向後推移，1990年代的慰安婦訴訟曾經援引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透過奴隸制與性暴力提出「日軍性奴隸」的概念與日本政府「隨軍慰安婦」的說法對抗。<sup>16</sup>同樣的，強制徵工訴訟亦援引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定義之奴隸制與強制勞動的觀點，以「人權侵害」對抗總動

15 這個時期的東亞協同體論體系龐雜，除了經常在泛亞主義的問題意識中被討論，內部的思想光譜亦難以在此完全涵蓋。本文無意簡化問題的複雜性，唯礙於篇幅僅以蠟山政道的論述為例，呈現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間發展的區域主義政治理論底下展開的東亞協同體思想中，自治的概念如何涉入帝國秩序對跨地域多民族治理的想像，並影響戰爭時期日本帝國對區域秩序的部署。

16 參見戰爭與和平女性博物館（Women's Active Museum on War and Peace）2013年有關日本軍性奴隸問題之報告（WAM 2013: 1）。

員戰爭底下「國家徵用」的論述（宇都宮健兒2019/07/23）。在這兩系列的訴訟爭議中，除了可以看見靠近葛塔秋描述的後殖民自決透過「帝國奴役」反思勞動剝削及殖民經濟的片段，也可以看見以人權話語取代帝國的戰爭語言的企圖。<sup>17</sup>

借徑《帝國後的世界創造》的問題意識，不難發現在東亞脈絡中帝國階序與自決話語彼此交錯的線索。也正是葛塔秋黑色大西洋敘事的後帝國—後殖民視野，遙遠而切近地向臺灣乃至東亞提示了一條重新探索自決概念的複雜面貌的可能途徑。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書目

民主進步黨（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2019/09/28。〈社會同行世代共贏決議文〉“shehui tongxing shidai gongying jueyiwen” [Resolution on joint progress of one society and mutual benefit among generations]。Retrieved from: <https://www.dpp.org.tw/media/contents/8778> on Mar. 3, 2020.

吳乃德（Wu, Nai-Teh）。2013。〈我們共同的故事〉“women gongtong di gushi” [Our common story]，《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一 *Bainian zhuiqiu: Taiwan minzhu yundong di gushi I* [One-hundred Years of Pursuit: Stories of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aiwan I]，陳翠蓮（Chen, Tsui-Lien）著，頁8-12。臺北（Taipei）：衛城出版（Acropolis）。

吳介民（Wu, Jieh-Min）。2004。〈台灣在帝國爭霸夾縫中的出路〉“Taiwan zai diguo zhengba jiafengzhong di chulu” [Taiwan's passage-out of the fissures of empires]。Retrieved from: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ujiehmin/home/she-hui-zheng-zhi-ping-lun/tai-wan-zai-di-guo-jia-feng-zhong-de-chu-lu> on Mar. 3, 2020.

---

17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人權宣言》與《國際人權憲章》所宣告的普世人權在不同的歷史背景及社會條件之下與帝國階序彼此交錯的複雜性。除了像是波士尼亞內戰、盧安達屠殺、科索沃戰爭中聯合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人道介入背後的帝國或霸權的政治企圖及戰略部署，乃至「人道帝國主義」（Bricomont 2006）的批評，或者當代政治分析中對人權、人道階序化的反思（Fassin 2012），皆反映出人權話語與帝國階序的親近性。戰後的解殖與自決運動中人權話語與帝國階序的複雜樣貌還需要深入在地與區域脈絡才能夠釐清，本文僅提供簡要提示。

吳叡人 (Wu, Rwei-Ren)。2016。〈受困：在帝國夾縫之中〉 “shoukun: zai diguo jiafeng zhizhong” [Impasse: amongst the fissures of empires]，〈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 *Shoukun de sixiang: Taiwan chongfan shijie* [The Thought of Impasse: Taiwan's Pivot to the World]，頁60-82。臺北 (Taipei)：衛城出版 (Acropolis)。

陳光興 (Chen, Kuan-Hsing)。1994。〈帝國之眼：「次」帝國與國族——國家的文化想像〉 “diguo zhiyan: ‘ci’ diguo yu guozu - guojia di wenhua xiangxiang” [The Imperialist Eye: The Cultural Imaginary of Sub-Empire and a Nation-State]，〈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Taiwan shehui yanjiu ji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第17期，頁149-222。

## 二、日文書目

宇都宮健児。2019/07/23。〈〔寄稿〕微用工問題の解決に向けて〉 (〈投書〉 朝向微用工問題之解決) 。Retrieved from: <http://japan.hani.co.kr/arti/opinion/33949.html> on Mar. 3, 2020.

辛島理人。2015。《帝国日本のアジア研究——総力戦体制・経済リアリズム・民主社会主義》 (《帝國日本的亞洲研究：總動員戰爭體制・經濟現實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東京：明石書店。

河西晃祐。2012。《帝国日本の拡張と崩壊》 (《帝國日本的擴張與崩壞》) 。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

米谷匡史。2003。〈矢内原忠雄の〈植民・社会政策〉論——植民地帝国日本における『社会』統治の問題——〉 (〈矢内原忠雄的「植民・社會政策」論：殖民地帝國日本之「社會」統治的問題〉) ，《思想》第 九四五期，頁138-153。東京：岩波書店。

——。2006。《アジア／日本》 (《亞洲／日本》) 。東京：岩波書店。

蠟山政道。1938。《世界の变局と日本の世界政策》 (《世界的變局與日本的世界政策》) 。東京：巖松堂書店。

——。1941。《東亜と世界》 (《東亞與世界》) 。東京：改造社。

## 三、英文書目

Adi, Hakim. 2018. “Du Bois and the Pan-African congress,” in *Pan-Africanism: A History*, pp. 43-59. London: Bloomsbury.

- Arrighi, Giovanni. 1978.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The premises of Hobson's definition," in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The Limits of Hobson's Paradigm*, pp. 35-48. London: NLB.
- Bricmont, Jean. 2006. *Humanitarian Imperialism: Using Human Rights to Sell War*.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 Duara, Prasenjit. 2003.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 Fassin, Didier. 2012. "Hierarchies of Humanity Intervening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n *Humanitarian Reason: A Moral History of the Present*, pp. 223-242.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tachew, Adom. 2019. *Worldmaking after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Self-Determinati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roy, Paul.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Consciousnes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nela, Erez. 2007. *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N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teman, Joe. 2020. "V. I. Lenin on the 'Black Question'," *Critique* 48 (1): 77-93.
- WAM. 2013. "Appendix. No.3," in *Japan/Alternative Report: On the Issue of Japan's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Retrieved from: [http://wam-peace.org/doc/Appendix3\\_UN.pdf](http://wam-peace.org/doc/Appendix3_UN.pdf) on Mar. 3, 2020.
- Young, Crawford. 2009. "The heritage of colonialism," in *Africa in World Politics: Reforming Political Order*, edited by John W. Harbeson and Donald Rothechild, pp. 19-38. CA: Westview.